

· 语言学 ·

语体变异研究的范式流转

刘立华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 语体变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从表达者到受众再到表达者的回归。语体变异的功能研究经历了从关注其反映性特征到关注其能动性特征的过渡, 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身份建构功能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其研究对象实现了由组群到个体的转变; 研究方法也呈现一种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趋势。

关键词: 语体; 视角; 建构; 个体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5)02-0095-05

一、引言

语体(style)是很难界定的一个学术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或是学术视野中,语体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这一概念与语言变异这一语言现象密切相关:不同的表达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或是表达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语言选择,社会语言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之为语体变异(stylistic variation)。语体变异成了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区域,其基本的比较极端的假设就是一个个体永远不会在任何场合都使用同样的语言形式或是说话方式。语体变异因此构成了语言研究的一个研究维度并贯穿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当中^①。纵观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体研究,不难发现,语体变异研究一直伴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一学科的成长;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从表达者到受众再到表达者视角的回归;经历了从关注其反映性特征到关注其能动性特征的过渡;语体

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身份建构功能得到强调;语体变异研究关注的重点则实现了由组群到个体的转变;其研究方法则呈现一种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趋势。

二、语体变异研究的视角转换

(一) 作为一种注意力的语体

拉波夫(Labov)^②把语体变异看作是一种单维度和单语的统一体,其对受试者的言语观察主要依靠受试者对阅读材料所付出的“注意力”,并以此为依据区分了有声望的语言(prestige)和土语(vernacular)。前者往往对应语言的谨慎语体,后者则与随便体密切相关。在拉波夫的研究中,处在两个极端的是有声望的语言(prestige)和脏语(stigma),拉波夫以此来衡量每个表达者的语体变化情况。他把处在P端看作是比较正式的语体形式,而处在另一端的S则是比较随便的语体形式。因此,表达者的语体变化与表达者在整个社会经济等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

收稿日期: 2014-10-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模式研究”(项目号: 13BXW031)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刘立华,男,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话语分析,跨文化传播,功能语言学。

^① Bell, A. Language Style as Audience Design [A]. In N.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A Reader and Coursebook [C].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② Labov, W.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M].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1966.
Labov, W. Hypercorrection by the Lower Middle Class as a Factor in Linguistic Change [A]. In William Labov (ed.). Sociolinguistics Patterns [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2: 122-142.

这一等级的反应策略有关。拉波夫据此认为,对某一语言变量的偏好反映了某一群体的社会分层。拉波夫以上研究开创了语体变异研究的先河,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 作为一种受众设计风格的语体

拉波夫对语体变异研究的“注意力”标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遭到了社会语言学家的批评^{①②③④}。Milroy指出,把话语的风格与阅读联系起来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各个言语社区对待阅读和读写能力(literacy)的态度并不统一^⑤。Milroy还通过对Belfast地区的研究得出,会话风格与阅读风格并不是在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中,它们具有不同的标准。

有些学者则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语体变异这一课题。Giles及其同事提出了言语调节理论^⑥。该理论认为,表达者在讲话过程中会根据受众不断调节他们的言语以便“赢得”受众同意。调节过程中一个共同的形式则是“趋同”,即表达者会在讲话的节奏、口音、内容以及停顿方面与听话者趋向一致。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表达者希望自己与受众区分开来,以表示自己的不同,则会力图保持自己的讲话风格,甚至是故意“偏离”受众。

在以上理论上,同时借鉴以前的相关研究^{⑦⑧⑨⑩⑪},新西兰社会语言学家Bell成为第一个试图对语体变异进行重新阐释的学者,他把听众放置在一个语体变异研究的中心地位^⑫,其创立的“受众设计模式”也是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语体变异研究应用最为广泛的分析框架。该模式认为,语体变异实际上是表达者对当前受众的一种回应,受众的范畴包括直接的听众,也包括第三方,即包括在场听众和无意听到谈话的人。

Bell认为语体是表达者个体相对其他个体在语言方面的选择^⑬。在该框架下,语体变异呈现出互动和社会属性,语体变异同时又是标记人际和群际关系的重要手段;语体变异的意义来源于一定的语言特征与特定组群之间的关系,某一组群的社会评价也因此与这一组群的语言特征联系起来。在受众设计这一研究模式中,表达者根据受众情况来设计他们的语体,表达者总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受众显示出“精巧的”语体变化能力,同时也会考虑其他类型的受众,例如录音者或是旁听者。更为重要的是,Bell认为语体在变化过程中兼具“回应性”(responsive)和“能动性”(initiative)特征。前者说明了语体变化是针对受众做出的回应变化;后者则能“启动”情景变化,即语体的能动作用。在回应性的语体变化中,语言和社会情景之间建立了规律性的联系;能动性的语体变化也利用了这种联系,把一种情景的特征或是“味道”融合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情景中,语体也因此成了能塑造情景的相对独立的变量。在随后的研究中,Bell认为,决定说话者语体转换的并不一定是听话者或在场听众,还可以是不在场而仅存在于说话者头脑中的一个参照者,即说话者想要与之认同身份的个人或群体。

(三) 语体变异研究的社会认知视角

拉波夫关于语体界定的标准是表达者的“注意力”,而Bell则从“受众”的角度来界定语体这一概念。Finegan和Biber(1994)的研究则试图从“情景”的角度来界定这一概念,他们认为社会方言变异取决于语域变异,而语域变异又取决于与各种交际情景相联系的交际规约。语体变异研究的情景标准势必与“语境”这一概念密切相关。van Dijk把语境定义为一种心理

① Coupland, N. Style-shifting in a Cardiff Work-setting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80, 9 (1): 1-12. Coupland, N. "Hark, Hark the Lark": Social Motivations for Phonological Style-shifting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985, 5 (3): 153-71.

② Cheshire, J. *Variation in an English Dialect: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M]. Cambridge: CUP, 1982.

③⑤ Bell, A. Language Style as Audience Design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84 (13): 145-204.

④ Milroy, L. *Observing and Analysing Natural Language* [M]. Oxford: Blackwell, 1987.

⑥ Giles, H. *Social Linguistics and Literacies: Ideologies in Discourse* [M]. London: Palmer, 1970. Giles, Howard and Powersland, Peter F. *Speech Style and Social Evaluation* [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5.

⑦ Van den Broeck, J. Class Difference in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the Flemish Town of Maaseik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77(6): 149-181.

⑧ Baugh, J. *Linguistic Style Shifting in Black English*.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9.

⑨ Hindle, Donald M. *The Social and Situational Conditioning of Phonetic Variat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9.

⑩ Rickford, John R. *Variation in a Creole Continuum: Quantitative and Implicational Approach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9.

⑪ Coupland, N. Style-shifting in a Cardiff Work-setting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80, 9 (1): 1-12.

⑫ Bell, A. Language Style as Audience Design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84 (13): 145-204. Bell, A. Styling the Other to Define the Self: A Study in New Zealand Identity Making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999 (3): 523-541.

⑬ Bell, A. Style and the Linguistic Repertoire [A]. In Carmen Llamas, Louise Mullany and Peter Stockwell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olinguistic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模式,是“话语参加者对相关情景因素的主观建构或是定义”^①。也就是说,语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例如社会语言学、会话分析)所界定的客观条件或是直接的原因,而是某一文化或是社区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动态的、不断行进的建构。语境模式是心理模式表征的心理建构体(mental constructs)。因此,语境是话语参加者对某一事件或是情景的界定,语境不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情景,而是我们在说话时所感知的情景,即话语参加者对交际情景的心理模式。语境模式与心理模式具有同样的特性和内容:语境模式与我们的个人经历一起存储在片段记忆当中。通常认为,这些语境模式相对简单,是由几个普遍的范畴组成,同时具有文化的特定性。van Dijk 认为,心理模式基础上的语境模式包括以下范畴:(1)背景,包括时间、时期,空间、地点或是环境等;(2)参加者;(3)自我(self),在这一范畴中,主要包括交际角色、社会角色类型、参加者之间的关系、共享的社会知识和信仰、目的和意图;(4)有关交际或是其他的行为或是事件^②。

在以上模式中,“自我”是一个处于中心的概念。语境的建构实际上是“自我”对当前情景的感知和建构,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社会认知的语境模式是一种具有“自我”个体性质的语境模式。话语参加者的社会身份可能具有多样性,但是语境模式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对“自我”的界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语境模式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模式”,“自我”因此构成了语境模式中一个中心的、具有指向性的范畴。这一范畴帮助界定了“我”(说话者、听话者或是其他的话语参加者角色)与其他话语参加者之间的关系。从语体生产的角度,这一“自我为中心的”语境模式构成了话语中指示表达成份的基础,例如:我、我们、这儿等。

语境模式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知识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或是知识机制(K-device)^③。语言使用者根据信仰或对接受者已知信息的估计,调整自己的话语或是作品。换言之,他们需要一个接受者的知识模型以及使自己的话语适应这一模型的策略,即K机制。这种知识策略有其自己的任务,即在话语创作的每一个点上计算出听话人已经知道的知识,并以此作为依据应该预设哪些知识、断言哪些知识或者提醒哪些知识。这些策略显然是以每一个成员与其认知群体中其他成员所共享的知识为基础。在van Dijk看来,K机制的主要功能在于把表达者的当前知识,其中包括心理模式中对事件的表征以及有关世界的共享社会知识输入到语境模式中并且计算这些知识中有多少是听话者知道的。

(四) 语体变异研究的身份说

如果说受众设计模式关注的是受众因素对语体变异的影响,那么Coupland等人^{④⑤⑥}的研究则又重新回到了表达者这一视角下,采取的也是更为动态的视角。他们把语体看作是具有回应性特征并且具有行使身份行为功能的语言资源。Coupland认为,“语体,特别是方言,是互动过程中自身和他者有策略地建构个体特定社会面貌(social personas)和立场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特征,是一种相对特定组群的自我身份确定或是自我区分的一种行为方式^⑦。与Bell重视说话者与听众的关系不同,Coupland关注的是表达者在话语中语言变量的策略使用问题;Bell的“听众设计”研究个体和群体语言变量使用的个案累加,而Coupland关注的是语体变量中那些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部分,而对语体变量的结构和变化不再积极关注。Coupland在语体研究中对“与表达者的自我面貌(persona)相联系的一组共现变量的强调”构成了语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起点,语体的能动性特征得到凸显,语体在建构社会归属关系以及身份的作用得到强调,语体的

①②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van Dijk, T. A. Knowledge in Parliamentary Debates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003, 2 (1): 93-129.

④ Coupland, N. “Hark, Hark the Lark”: Social Motivations for Phonological Style-shifting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985, 5 (3): 153-71. Coupland, N. Language, Situation, and the Relational Self: Theorizing Dialect-style in Sociolinguistics [A]. In P. Eckert, & J. R. Rickford (eds). *Style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oupland, N. The Discursive Framing of Phonological Acts of Identity [A]. In B. -L. Gunnarsson et al. (eds.). *Language Variation in Europe* [C]. Uppsala: Uppsala Universitet, 2004.

⑤ Le Page and Tabouret-Keller, A. *Acts of Identity: Creol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Ethnicity* [M]. Cambridge: CUP, 1985.

⑥ Rampton, B. *Crossing: Language and Ethnicity among Adolescents* [M]. London: Longman, 1995.

⑦ Thurlow, C and Jaworski, A. The Alchemy of the Upwardly Mobile: Symbolic Capital and the Stylization of Elites in Frequent-flyer Programmes [J]. *Discourse & Society*, 2006, vol 17 (1): 99-135.

“可实施性”^① 构成了语体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语体变异研究中的功能视角转换

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的文本形式,所有的话语实践形式无一不是社会地、历史地建构,是各种社会资源的再生产和配置过程,是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欲望的重新编码,意义所栖息的话语作为一个意义争斗的场所迫使人们越发开始对其合法性策略进行思考。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语言学家、理论学家以及社会学家都在思考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语言不再被看作是对现实的“反映”,或“忠实的编码”,而被看作是对现实的重新解读和编码。在这一过程中,某一群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隐含的意义被编入到语言中,进而形成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语言或是话语中的权力关系进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语言学起先关注的是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考察语言特征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语体被定义为“个体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的语言运用方式或是不同的语言特征”。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转向以及社会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语言的不同使用方式或特征在某一语境下的社会能动作用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人们愈发注意到语体与个体身份之间的必然联系,即个体或是组群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言语或是符号呈现出来,或是说,这些言语或是符号“塑造”了某一个体或是群体的身份。

自从社会语言学这一学科建立以来,身份研究一直是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其早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63年拉波夫对Martha Vineyard中某一元音的研究。随着后现代视角下语言建构作用不断得到强调,语言被看作是互动过程中具有能动建构特征的工具,即Bell所指出的语体的“能动作用(initiative)”^{②③}。英国的城市青年会使用一些他们不经常使用的语言,例如克里奥尔(Jamacian creole)或是旁遮普语(Punjabi)作为表现他们不同身份的手段。这一现象与Bell

所主张的“参照者设计”(referee design)有相似之处,表达者会故意使用某一组群或是自己所在组群的变异语言以表明自己与该组群的从属关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Natalie Schilling-Estes对两个北卡罗来纳州年轻人的会话进行了研究,发现两人在会话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讲话风格或是语体以“包容”(accommodate)对方,其方式有时是“趋同”有时是“分离”。Natalie Schilling-Estes的研究也说明了表达者是如何使用语言来主动呈现他们的立场和个体特征(persona)。Coupland的研究则关注表达者自己,并且把语体变异看作是“自我”身份的动态呈现,这一研究强调话语中语言变量的使用策略,关注表达者的身份建构,同时把语体变异看作是一组与表达者个人特征相联系的共现变量。

四、语体变异研究从组群到个体的转变

(一) 语体变异研究中个体凸显的研究取向

语体变异研究旨在讨论作为个体的人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讲话风格。拉波夫的“注意力”标准也是从个体出发研究某个群体的语言使用情况并以此作为依据来进一步探讨语言的分层作用。Ochs^④和Butler^⑤等人通过解析个体对社会规约的展演行为,展示出社会规约的作用过程。Eckert^⑥等人也是着眼于个体,发展了言语社区理论,提出“实践社区”理念,认为人的成长是一种身份协商和构建的过程;批评话语分析学派从整体上也是从语言分析出发,对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进行更明晰地阐释,突出个体通过语言建构社会身份、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作用^⑦。

(二) 语体变异研究中个体凸显的社会政治缘由

语体变异研究伴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而发展。互动社会语言学的会话实践研究反映了社会语言学从群体和社区的社会学研究到个体和身份研究的转变。在从方言学和语言学的社会研究到话语分析和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个体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机制方面所采取的语言机

① Rickford, J. R. & McNair-Knox, F. Addressee-and Topic-influenced Style Shift: A Quantitative Sociolinguistic Study [A]. In D. Biber and E. Finegan (eds.).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Register*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35-76.

② Coupland, N. Language, Situation, and the Relational Self: Theorizing Dialect-style in Sociolinguistics [A]. In P. Eckert. & J. R. Rickford (eds.). *Style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Schilling-Estes, N. Constructing Ethnicity in Interaction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4 (8): 163-195.

④ Ochs, E. Indexing Gender [A]. In A. Duranti & C. Goodwin (eds.).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⑤ Butler, J.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Subversion of Identity*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⑥ Eckert, P. *Linguistic Vari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Belten High* [M].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⑦ 谷小娟、李艺 《语言与身份建构: 相关文献综述》,《外语学刊》2007年第6期,第101-108页。

制逐步得到社会语言学学者的重视。Gumperz 和 Cook-Gumperz 认为^①, 现代社会的形成与政治机构的调节密切相关, 政治机构影响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对“交际”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性不断提高, 多样性不断扩大的城市生活要求更多的人际沟通和言语劝说(verbal persuasion)。在当前全球化的视野下, 不同组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虽然重要,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身份和语体的转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因此, 我们有必要呈现一个连续的个体身份, 该身份在保持一种历史连续的同时又能超越现在。从另一方面来讲, 现代社会后期为个体变化和个体的进步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可能。在一个以现代生活为特征的社会中, 个体在许多互有重合的区域中不断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些位置在经受危险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着重新发现^②。

Giddens 指出^③, 现代社会后期的新的生活方式“代表了人类个体从需求和等级控制到政治选择的转变。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 的核心正是生活风格的选择以及从政治结果流动中个体自我实现”。语体选择构成了以上选择的重要的维度。语体就像不同的衣服一样, 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④。然而, 语体却不像衣服那样善变, 一旦形成, 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语

体进而构成了个体身份呈现的主要内容^⑤, 这也是为何语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⑥

五、结语

在早期的有关语体变异的研究中, 语体被看作是情景的一个变量或是表达者的“注意力”, 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定量研究和观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模式遭到了批评, 在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的努力下, Bell 提出了“受众设计模式”, 该模式在充分考虑受众因素的同时, 研究方法也不再拘泥于完全的定量研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该类研究的增多^{⑦⑧⑨⑩⑪}, 语体变异研究逐渐构成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分支, 研究方法也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为主, 例如: Allan Bell、Penelope Eckert、Ben Rampton、Nik Coupland 等人。近年来有关语体变异研究主要侧重语体作为一种个体身份建构的符号资源, 例如 Coupland 等人的研究, 研究方法更加取向一种整合的态势。正如 Bell 指出的那样, “语体研究目前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互相结合使用”^⑫。这一研究方法的结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语言学语体变异研究的一个趋势。

(责任编辑: 林春香)

① Gumperz, John J. and Jenny Cook-Gumperz. Studying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Sociolinguistics or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8 (4): 532 - 545.

② Beck, Ulrich,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s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Giddens, A.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④ Irvine, J. Style as Distinctiveness: The Culture and Ideology of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A]. In Penelope Eckert and John R. Rickford (eds.). *Style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 Cambridge: CUP, 2001: 21 - 43.

⑤ Gumperz, John J. and Jenny Cook-Gumperz. Style and Identity in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A]. In Peter Auer (ed.). *Style and Social Identities: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C]. Berlin, Germany: Mouton de Gruyter, 2007: 477 - 498.

⑥ Eckert, P. and Rickford, John R. *Style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⑦ Biber, D. and Finegan, E.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Register*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⑧ Preston, D. Sorting out the Variables in Sociolinguistic Theory [J]. *American Speech*, 1991 (66): 33 - 56.

⑨ Yaeger-Dror, M.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Hyperaccommodation of (r) by Singers from a Mizrahi Background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991, 11(4): 309 - 331.

⑩ Finegan, E. & Biber, D. Register and Social Dialect Vari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 In D. Biber & E. Finegan (eds).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Register*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15 - 47.

⑪ Rickford, J. R. & McNair-Knox, F. Addressee-and Topic-influenced Style Shift: A Quantitative Sociolinguistic Study [A]. In D. Biber and E. Finegan (eds).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Register*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35 - 76.

⑫ Bell, A. Style and the Linguistic Repertoire [A]. In Carmen Llamas, Louise Mullany and Peter Stockwell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olinguistic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writers prefer the portrayal of legendary heroes with artistic exaggeration, while the Chinese Taiwan writers have a predilection for realistically depicting the torments of protagonists. Besides, the Taiwanese focus on scenarios of both romance and business. The romance, rather than business, is the highlight of the novel. Mainlanders, however, keep everything subjected to the work and romance is just the icing on the cake.

Humanity: Blooming beneath the Veil or Pursuit in Lost

DONG Hui

Both Northeast Writers Group and Northeast Writers in Taiwan pay much attention to humanity in the anti-Japanese themes. The former show humanity subtly in the narration of hearth, countr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while the latter in the Country Lost and Nostalgic Lost.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differences in four aspects specifically. The primitive sense for survival becomes stronger in endurance or sublimates in exile. The deep-seated hatred is soothed by the bloody massacre or the compassion of sympathy. The feelings of gratitude bring a martyr's death or dignity. Facing precious love, whether withered under oppression or lost in full bloom.

From the History to the Movie: Anti-Japanese Imagination in Seediq Bale and Nanjing! Nanjing!

LIU Fang

The film Seediq Bale directed by Wei Te-sheng anti-Japanese violently: Mona Rudao clearly distinguished alien races (Japanese) from the Han people and foreigners, Mahebo tribe from other tribes, and treated them with hierarchical love of Confucianism and held out against Japanese; some others became middle character. By contrast, Nanjing! Nanjing! showed the anxiety of no hero and searched for the kindness in the enemy.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the film and history will get a clearer and deeper field of view than before.

Paradigm Shift of Stylistic Variation

LIU Li-hua

Stylistic variation, as one of the major research areas in sociolinguistics, has manifest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its developmental traces. The perspective has shifted from speaker to the audience and then to the speaker again; the constructive function, rather than the reflective function of stylistic choices has been given much attention, and thus the question of how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and shaped in the surrounding world has been also emphasized; social individual's stylistic choices have been given much focus, and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s preferred by the researcher in this field.

An Analysis of Metaphors and Frames in Official Media Report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ZHANG Wei, MAO Hao-ran, WANG Shao-hua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metaphors and frames, as well as their corresponding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in the official media report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ased on SARS and H7N9 avian influenza (120 reports in total). It is found that: (1) The main similarities in two epidemic reports lie in that the MYSTERY metaphor and HORROR frame were used, which aggravated the early public panic to some extent. The WAR metaphor, RACE metaphor and relate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d INCENTIVE frames were used later to strengthen national cohesion that contributed to defending disease. (2) The Differences are "different frequencies of the same metaphor", "different focuses in the same frame", "different frames with the same aim", which illustrated that the media was much more mature and professional in the face of public emergencies. (3) It is revealed that in official media, the expected communication goals are usually achieved through mental manipulation by using metaphors that carry ideology con-